

罗 森等

早期日本游记五种

· 记述从闭关锁国到甲午战争四十年间的日本 ·



K931.39/4



走向世界叢書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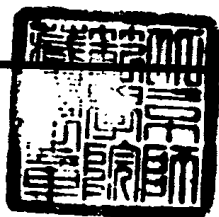


20900467

罗 森 等

早期日本游记五种

王晓秋 点 史 鹏 校



湖 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

900467

罗 森等

早期日本游记五种

王晓秋点 史 鹏校

责任编辑：钟叔河 杨向群

装帧设计：易 地

•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•

1983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66,000 印张：8.75 印数：1—12,200

统一书号：11109·212 定价：0.87元

目		录
---	--	---

《走向世界丛书》总序..... 1

·文与其人·

始穿重雾看东邻

——《早期日本游记五种》序 王晓秋 · 5

日本日记 罗 森 · 27

使东述略 何如璋 · 45

〔附〕使东杂咏 69

日本纪游 李葆圃 · 87

游历日本余纪 傅云龙 · 109

前编上 109

D13944-29

前编下.....	140
后编.....	183
东游日记	黄庆澄 · 219

• 图片 •

明治时期的日本神庙	(封面)
清国人罗森像(日本楸形赤子画)	(扉页)
明治天皇接见驻外使节图	(插页)
被理(M·C·Perry)像	(插页)
《东游日记》书影	(插页)

总序

人们常说，今日之世界，是一个“迅速缩小的世界”（rapidly shrinking world）。在电视卫星、激光通信和波音747时代，地球上各地之间的距离，确实好象越来越短；人们相互间的接触和交流，也确实越来越方便和密切了。

可是，只要回头一看，就可以看到，仅仅在几代人以前，异国还显得那样的离奇和遥远。古代欧洲人说，中国人用小米和青芦喂一种类似蜘蛛的昆虫，喂到第五年虫肚子胀裂开，就从里面取出丝来（见Pausanias《希腊纪事》）。古代中国人则曾经相信，西方有种羊羔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，脐带还连着大地（见《旧唐书·西戎传》及《康熙御制渊鉴类函·边塞部九》）。这类海外奇谈，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；而在过去上千年中，却一直被当作可靠的知识，记载在享有权威的史书上。由此可见，人类文明的发展，经历了一条何等漫长曲折的道路。

为了探索和开辟外部世界，丰富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，各国人民都作过许多贡献。人类文明史象叙述伟大的发明家和著作家一样，将永远铭记着张骞、玄奘、鉴真、郑和和马可波罗、哥伦布等不朽的名字。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：一个民族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历史，也就是它的人民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。

历史的发展从来是不平衡的。当黄河、长江已经哺育出精美辉煌的古代文化时，泰晤士、莱茵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，还在黑暗的原始森林里徘徊。而自从地理大发现和产业革命以来，中国却相对地落后了。在西方实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以后，中国还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国家。是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，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。范文澜称林则徐为清代“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”。因为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到中国来时，林则徐首当其冲；是他首先感到世界在缩小，距离和壁垒再也不能把异国隔离开了。

封建时代的中国读书人，在“严夷夏之大防”的封闭社会里度过了上千年。封闭的外壳被打破后怎么办？顽固派的办法是学鸵鸟；象慈禧太后最为信用的大学士徐桐，见了“洋人”就“以扇蔽面”。庚子年间他焚香叩请骊山老母下凡来“杀尽洋人”，结果骊山老母没有下凡，自己的老命却送掉了。林则徐、魏源等则不同，提出要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，就是主张学习外国的长处，来对付外国的侵略。要学习，先得了解。于是林则徐编了《四洲志》，魏源编了《海国图志》。虽然他们未能亲身出国去考察，书的材料靠

间接采辑而来，难免有许多谬误。但无论如何，地里长羊羔之类的神话，毕竟是逐步让位给常识了。

在林、魏之后，中国才开始有读书人走出过去闭锁的国门，到欧美日本去学习、访问和工作。容闳一八四七年留学美国，斌椿、张德彝等一八六六年游历欧洲，志刚、孙家谷一八六八年出使泰西，这算是最早的。接着出国的人渐渐多了起来，尽管其中不少是奉派去的政府官员，但去了就不会不接触近(现)代的科学文化、社会生活和政治思想，也就不能不在中国发生影响。

《走向世界丛书》专收一八四〇——一九一一期间访问欧美日本的中国人的记述。毛泽东说：“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，先进的中国人，经过千辛万苦，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。洪秀全、康有为、严复和孙中山，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。”丛书所收虽不全属这一派人物的作品，总而言之都是中国人在近代走向世界的实录，都有它文化的趣味和历史的价值。

必须指出的一点是：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中，西方国家虽在许多方面比中国先进，值得中国人学习，但资本主义的本质，总是要压迫剥削比他们落后的民族的。中国人走向世界、接触西方，既有一个如何学习外国长处的问题，又有一个怎样抵抗外国侵略的问题，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错误的。对于某些作品中偶或流露的这类观点，各书卷首“文与其人”的评论文章中，将试着作些分析，供读者参考。

“洋为中用”是我们今天的主张，也是十九世纪先进的中国人的主张。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，不也是“洋为中用”吗？当然，随着接触和认识的逐步深入，人们慢慢地看出：仅仅学一点“长技”，搞一点坚船利炮，还是不行的。要救国，只有维新；维新行不通，就只有革命。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也是在一八七八年出国以后，“始见轮舟之奇，沧海之阔，自是有慕西学之心，穷天地之想”，才立下了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大志和信心。历史无情亦有情，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，但前人的足迹总可以留作后人借鉴，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。

今天的世界已不是十九世纪的世界，今天的中国更不是清朝末年的中国。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。但是，世界的进步越来越快，我们的经济、文化等各个方面还需要不断发展、提高，这就必须继续打开眼界、走向世界。打开眼界以后，还要学会分析，分清好的和坏的。一切好的东西，要“拿来”为我所用；一切有害的东西，要实行抵制和预防。在这方面，前人的经验和教训，有一些也仍然值得我们注意。

谨将这套小小的丛书，奉献给爱好历史与文化、关心中国和世界的读者。希望它能在中国向世界开放，同时世界也向中国开放的进程中，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。是为序。

编者 一九八〇年七月

始穿重雾看东邻

——《早期日本游记五种》序

• 王晓秋 •

古老的封建中国是内向的。日本是中国的东邻，而中国对日本知之甚少的情況，从古代一直到上个世纪中叶还没有什么改变。这里辑印为一册的五种早期日本游记，和黄遵宪、王之春关于日本的著作一样，是近代中国人开始直接观察日本的纪录。

只一衣带水，便隔十重雾

人们常用“一衣带水”形容中日两国间的距离。这个距离的确不能算远，现代喷气客机只须一两小时便能跨越。

可是，唐朝鉴真和尚六次东渡，双目失明，九死一生，才到达彼岸。而日本人阿倍仲麻吕（晁衡）从唐朝回国，海上遇难，竟漂泊到了越南。可见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，这“一衣带水”却真成了阻碍人们交通的天堑。

但限制人们脚步和视野的，还不仅仅只是高山和远海。黄遵宪光绪十三年写的《日本国志·自叙》讲得好：

自封建废而为郡县，中国归于一统，不复修遣使列邦之礼。……昔契丹主有言，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，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。以余观日本士夫，类能读中国之书，考中国之事。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事，足已自封，于外事不屑措意。无论泰西，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，击柝相闻，朝发可以夕至，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，可望而不可即；若邹衍之谈九洲，一似六合之外，荒诞不足论议也者，可不谓狭隘欤？

在古代历史上，日本人到中国来的时候，确比中国人到日本去的时候为多。秦始皇派徐福入海求仙，究竟是否与日本真有关系，史家见解不一，可以存而不论。自从《汉书》起的历代中国史书，关于日本（倭人、倭国……）的记载，几乎都是得之于航来的日本人。

《汉书》云：“乐浪海中有倭人，分为百餘国，以岁时来献见”。

《三国志·魏志》记述了景初二年（公元二三八年）六月倭人“邪马台国”女王卑弥呼遣大夫难升米等来中国的情况。

《隋书》载有大业三年（公元六〇七年）倭国“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”的国书。

到唐代，日本“遣唐使”来中国，已经成为经常的事情，出现了阿倍仲麻吕和空海这些著名人物。当时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李白、王维等人都有赠阿倍仲麻吕（汉名晁衡）的诗作，可是他们对于日本的知识却是渺茫的。

唐朝的兴盛时期过去后，走下坡路的封建国家越来越内向。明太祖朱元璋大杀功臣，给被杀的人一律加上“通高丽”、“通日本”的罪名，其实都没有这么一回事。他在留下的“皇明祖训”中正式把日本和朝鲜、安南、真腊等全都列为“不征诸国”。“不征”也就是“不惹”的意思，不过勉强装出一点儿霸气这么说罢了。

但是，你不去，不等于他不来。由日本浪人形成的倭寇，在明朝就成了中国东南沿海的一害。丰臣秀吉的军队，也渡海打到了朝鲜，威胁到中国东北边疆。这就说明，随着历史的进化，世界各国迟早不能不互相打交道，这一点是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。

到明朝中叶，中国才开始出现关于日本的私人著作，但多袭陈言，缺少价值。可以提到的只有薛俊的《日本考略》，其中记录了三百五十八个日本词语的汉语对音；郑若曾的《日本图纂》，根据日本商人和到过日本的中国商人的叙述，图画过一些日本风物；还有郑舜功的《日本一鉴》，署名侯继高的《日本风土记》，李言恭的《日本考》等几种小书。

明亡以后，一些文人逃到了日本，在台湾抗清的郑成功也是中日混血儿。这更加触了清朝统治者的忌讳，成为康熙皇帝在一度开放海禁之后很快就更严厉地实行“禁海”的重要原因。

跟清朝政府厉行禁海差不多同时，日本德川幕府也实行闭关锁国，只允许中国同荷兰的少量商船在长崎一港进行严格管制下的贸易。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仍旧无法深入。

康熙年间，有几个著名的文人写过日本。朱彝尊（竹垞）见日本古史《吾妻镜》，诧为“海外奇书”，为之作跋。因《南山集》一案被杀头的戴名世，曾著《日本风土记》，说“日本即倭奴国，与中国隔绝东海。……至今海外诸国无不上表入贡，闻日本独否”。尤西堂也写过一组《外国竹枝词》，其中《日本》一首是：

日出天皇号至尊，五畿七道附庸臣。

空传历代吾妻镜，大阁终归木下人。

自注云：“隋时致书，自称‘日出处天子’。国中称天皇，以尊为号。有五畿七道二岛，附庸国百餘。《吾妻镜》纪本国君臣事迹。吾妻，岛名也。木下人为平秀吉，万历中篡夺倭国，自号大阁王。”很明显仍旧是以史书和耳食为根据。

雍正年间（一七三〇年）陈伦炯的《海国闻见录》和乾隆年间（一七六四年）汪鹏的《袖海篇》，因为作者曾随商船到过长崎，所以有一些实地的观察。如陈书记录了当时

的一条谚语：“日本好货，五岛难过。”汪书说长崎“风土甚佳，山辉川媚；人之聪慧灵敏，不亚中华儿女。”还有一个福建人沙起云，也写过十六首《日本杂咏》，描写长崎的风俗。但由于他们的足迹只限于长崎划给中国商人居住的“唐馆”，见闻仍然是浅陋的。象陈伦炯便把日本错认为是由长崎、萨岬马（萨摩）、对马“三岛”组成的国家，简直有点类似于瞎子摸象。

由于对日本的无知，乾隆年间查禁私钱时，在沿海发现一枚日本的“宽永通宝”，竟成为震惊中国朝野的大事（因为“建立年号、铸造通货”是造反立国才有的事情）。皇帝下令询问各省大吏，闹得“守令仓皇，莫知所措”，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枚铜钱的来历。这种情形，直到鸦片战争时期，仍没有多大改变，无怪黄遵宪要浩叹“只一衣带水，便隔十重雾”了！

日本“开国”的目击者

当一八四零年英国用大炮打开中国的通商五口之后不久，一八五三和一八五四连续两年，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登·柏利（M·C·Perry，1794—1858）率领的舰队也开到了日本江户湾，强迫日本结束闭关锁国的政策，将下田和箱馆两个港口向美国开放。颇为有趣的是，这支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“黑船”（因为当时的美国船只的外壳多漆成黑色）的舰队里，却有一位为美国人服务的中国人罗森。他曾将此行见闻，写成一部《日本日记》，在一八五四

——一八五五年香港的中文月刊《遐迩贯珍》上发表。这是现知中国近代人所写的第一部日本见闻录，也是这次重大历史事件的一份目击记。

关于罗森的生平，我们知道得不多，只能从他的日记和《遐迩贯珍》编者的弁言里知道他是广东人，和香港的英美传教士是朋友。他的中国文字根柢似乎不很好，日记里的几首诗写得实在不高明，但可能懂得英文，所以才在香港被请上了柏利将军（日记称为“提督被里”）的兵舰。日记上所记的“通理国师”（翻译）卫廉士，估计即在香港的美国传教士Samuel Wells Williams（1812—1884），罗森很可能便是由他介绍给柏利将军的。罗森虽不会日语，但当时日本读书人都能识、写汉文，因此他可以同日本人进行“笔谈”，这无疑对美国人是有用处的。在这部日记和日本人写的《金川游记》中，都有罗森和日本人笔谈的记载。

罗森参加的是柏利舰队第二次的日本之行。舰队于一八五四年一月十七日从香港出发，过台湾海峡，先到琉球（琉球也是美国的一个目标），于一八五四年二月十一日驶抵日本江户湾浦贺港。他在日本谈判、签约、游览后，再经琉球，于同年八月七日回到香港，历时共半年有餘。

罗森的文笔虽不佳妙，难得的是他以当事人的身份，把古老日本刚刚开放时的历史面貌，以及当时琉球、横滨、下田、箱馆等地的风土、民情、政俗、物产，如实地作了一番记录。由于他是一个接触过西洋文化的人，又亲身参

加了重要的外交谈判，与日本的官员、文士、僧人有所接触，尽管他留下的日记篇幅不长，在观察的广度和深度上，却大大超过了以前中国一切关于日本的记述。这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人认识的差异，不是用文字高下、经历多少所能衡量和区别的。

罗森日记中称道琉球人民“甘守朴俭，不务奢华，亦鲜欺诈。板门纸窗，夜间亦不防窃。会见途中拾物，亦能以返原人。公门之内，冷冷落落，并无案牍之烦。淳朴之风，略有同于上古之世。”他也写到当时日本的社会秩序甚好，“夫一方斯有一方之善政。日本虽国小于中华，然而抢掠暴劫之风，亦未尝见。破其屋，门虽以纸糊，亦无有鼠窃狗偷之弊。此见致治之略，各有其能矣。”在资本主义没有影响到的“小国寡民”，也可能有这种“略有同于上古之世”的景象，但这毕竟是不能持久的。

当柏利舰队初到横滨时，日本幕府的态度是严加防范。“日本官艇，亦有百数，泊于远岸，皆是布帆，而军营器械各亦准备，以防人之不仁。”美方人员上岸住进公馆后，日方以馈送粟米为名，又“遣肥人九十余名，俱裸体，一夫获举二三包；不一时而数百包之粟米，尽迁于海畔。再后，复使肥人清服赤体，以武力角于公馆之埽”。以此向美方显示“日本之多勇力人也”。而当时日本人民对外国更是非常陌生和疑惧。罗森随美国人到达下田时，“因亚国（美国）船初至此，人民不知何故，是先逃于远乡者过半”。他们往游町上，“女畏见外方之人”，在横滨、下田都只遇见一位

妇女。这种情况，和一百三十年后的今天相比，显得多么不同！然而日本民族毕竟在短短的一百三十年时间内，变成了今天这样开放和技术发达的民族，这难道不正好说明历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吗？

当时罗森对西洋国家和新鲜事物的了解，要高于和柏利一行打交道的日本官员（其中包括了“大学头”林鹳殿、“民部少辅”伊泽美作守、井大对马等人）。有位叫平山谦二郎的，曾用汉文给罗森写过一封信，说：

我祖宗绝交于外邦者，以其利以惑愚夫，究理之奇术以骗顽民。顽民相竞，唯利是趣，唯奇是趣，骀骀乎至于忘忠孝廉耻，而无父无君之极也！……全地球之中，礼让信义以交焉，则大和流行，天地惠然之心见矣。若夫贸易竞利以交焉，则争狠讼所由起，宁不如无焉！……向乔寓合众国火船，而周游乎四海，有亲观焉者乎？若不然，请足迹到处，必以此通说各国君王，是继孔孟之志于千万年后，以扩于全世界中者也。

这种观点，和中国的顽固守旧派并没有什么不同。还有一位叫明笃的在同罗森笔谈时问罗：“子乃中国之士，何归缺舌之门？孟子所谓下乔木而入幽谷者，非欤？”罗森用一首诗作了回答，其中有云：

从古英雄犹佩剑，当今豪杰亦埋轮。
乘风破浪平生愿，万里遥遥若比邻。

思想和眼界都比日本人要开阔得多了。